

Rothbard, M. N. (1987). Breaking out of the Walrasian box: the cases of Schumpeter and Hansen.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1), 97-108.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打破瓦尔拉斯的盒子：熊彼特和汉森的案例

穆瑞·N. 罗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 *

自二战以来，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 (Leon Walras, 1834–1910) 的一般均衡范式。¹经济分析现在包括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概念的解释和阐述，在一般均衡中经济追求无休止的、不变的循环活动——瓦尔拉斯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恰当地称之为“循环流动” (the circular flow)。由于根据定义均衡经济是一种不变的、永不结束的机器人般的行为，市场上的每个人都对现在和未来有完全的了解，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完全消失了。由于没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利润和损失都消失了，每个商业企业都发现它的销售价格正好等于它的生产成本。

瓦尔拉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与社会科学实质上的数学化同时发生，这绝非偶然。数学享有真正“科学”的声誉，但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企业家精神和人的行动来说，其混乱和模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的错误很难被数学化。然而，一旦消除了这些行动和不确定性，就很容易使用代数和几何的切线来分析这种非现实 (unrealistic) 但易于数学化的均衡状态。

大多数主流经济理论家都满足于花时间阐述一般均衡状态，并简单地假设这种状态是现实世界活动的准确呈现。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考虑一般均衡。他们一直渴望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动态变化的现实世界。因为变化显然是存在的，对于一些瓦尔拉斯主义者来说，仅仅将一般均衡分析转化到现实世界而不计较结果是不够的。

曾宣称莱昂·瓦尔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经济学家的约瑟夫·A. 熊彼特 (1883–1950) 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作为一名瓦尔拉斯主义者，熊彼特认为一般均衡是压倒一切的现实；然而，由于现实世界中显然存在变化、企业家精神、利润和损失，熊彼特给自己提出了将这种变化的理论解释整合到瓦尔拉斯主义体系中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因为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不同，不能将一般均衡视为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达到的长期趋势。对于熊彼特来说，一般均衡必须是压倒一切的现实：他试图解释经济变化的现实起点和终点。²

* 笔者多年前从哥伦比亚大学亚瑟·F. 伯恩斯 (Arthur F. Burns) 教授的讲座中了解到这篇文章的基本见解。

¹ 二战前，至少在英美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新李嘉图主义部分均衡理论。在那个时代，瓦尔拉斯和他的追随者，最早是意大利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被称为“洛桑学派”。随着瓦尔拉斯主义对主流的征服，曾经只是一个学派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微观经济学”。

² 在坚持认为熊彼特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多于受瓦尔拉斯的影响时，穆罕默德·汗忽略了这样一

要从瓦尔拉斯主义的角度提出一种经济变化理论，熊彼特必须从处于一般均衡的真实状态的经济开始。然后他必须解释变化，但这种变化总是必须回归均衡状态，因为没有这样的回归的话，瓦尔拉斯的均衡只会在过去时间的一个点上是真的，而不会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实。但是瓦尔拉斯的均衡是一个永不结束的世界；具体来说，它描述了经济中一组固定不变的个人品味、技术和资源的后果。于是，熊彼特从一个瓦尔拉斯的盒子里的经济开始。发生任何变化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改变这些静态给定中的一个或多个。

此外，熊彼特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在瓦尔拉斯主义的模型中，利润和损失为零，但资本家根据所谓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继续赚取利率。利息费用已纳入成本。但是熊彼特身上庞巴维克的学生的烙印太重，以至于无法接受对利息的粗略的生产力解释。奥地利学派的路径是用一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即市场对现在财货的偏好高于未来财货的比率）来解释利息。但熊彼特也拒绝了时间偏好的概念，因此他得出结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利率以及利润和损失都为零。

熊彼特承认消费贷款存在时间偏好——因此也存在利息，但他对生产结构感兴趣。在这里，他强调了一——以此反对利息的粗略的生产力理论——奥地利学派的归属（*imputation*）概念，其中产品的价值被归属回生产要素，在均衡状态下没有净回报。同样，熊彼特以奥地利学派的方式表明，资本财货最终可以分解为两个原始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力。³但是，熊彼特忽略了，或者说

个事实：熊彼特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一本仍未翻译成英文的书，《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主要内容》（*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1908），在他还是庞巴维克的学生时写的，是一部激进的瓦尔拉斯主义著作。《性质》不仅是一次对数学方法的非数学辩护，它也是一次对瓦尔拉斯主义一般均衡的研究，将经济事件描述为物理实体的机械定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因此，弗里茨·马赫卢普写道

熊彼特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定量科学，是一个以“商品数量”为要素的均衡系统，这使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动机”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在方法论上错误的（Fritz Machlup,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3 May 1951: 146–47）。

参见 Mohammed Shabbir Khan, *Schumpeter’s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ligarh, India: Muslim University of India, 1957)。

关于《性质》，参见 Erich Schneider, *Joseph Schumpeter: Life and Work of a Great Social Scientist*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Bureau of Business Research, 1975), pp. 5–8. 关于作为瓦尔拉斯主义者的熊彼特，另见 Schneider, “Schumpeter’s Early German Work, 1906–17,”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ay 1951): 1–4; 以及 Arthur W. Marget, “The Monetary Aspects of the Schumpeterian System,” *ibid.* p. 112ff. 关于熊彼特不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另见 “Haberler on Schumpeter,” in Henry W. Spiegel, 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52), pp. 742–43.

³ 因此，熊彼特写道

在正常的循环流动中，整个价值产品必须归属于原始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的服务；因此，生产的全部收入必须在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除了工资和租金之外，不可能有永久的净收入。一方面是竞争，另一方面是归属，这必然会消灭收入

拒绝了，关键的庞巴维克的时间概念和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偏好。资本财货不仅是凝结的土地和劳动力；它们是凝结的土地、劳动力和时间，而利息是对“时间”的支付。在生产性贷款中，债权人当然在将“现在财货”（可以在现在使用的货币）换成“未来财货”（只能在未来使用的货币）。时间偏好的原始事实表明，每个人都更愿意在现在而不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现在财货总是比同等未来财货的**当前预期**更有价值。因此，在任何给定时间，未来财货在市场上要按时间偏好的社会率贴现。

这个过程如何在一次贷款（一次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交换）中运作是明显的。但是，庞巴维克对时间偏好和利息的分析更深入，并且远远超出了贷款市场，因为他表明，时间偏好和因此的利息回报存在于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下。对于购买或租用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资本家来说，他们是用货币（现在财货）购买这些要素，期望它们将产生未来的产出（无论是资本财货还是消费财货）回报。简而言之，对资本家来说，这些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力）是未来财货。或者，换一种说法，土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只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被出售并因此产生一个货币回报——但现在，资本家在现在要向它们支付工资或租金。

因此，在庞巴维克或奥地利学派的见解中，生产要素——因此工人或土地所有者——并不像在新古典的分析中那样，在均衡状态下赚取其边际价值产品（marginal value product）。它们赚取按时间偏好率或利率贴现的边际价值产品。而资本家，因其为要素提供现在财货并等待未来的回报而获得贴现。⁴因此，时间偏好和利息收入存在于均衡状态中，不仅作为贷款费用，而且作为每个投资资本家赚取的回报。

熊彼特可以否认时间偏好，因为他可以以某种方式完全否认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对于熊彼特来说，在均衡中生产显然不需要时间，因为生产和消费是“同步的”。⁵时间被从描述中抹去，即使是在假设资本财货的累积存量以及此

超过支出的任何剩余，消灭产品价值超过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价值的任何过剩。原始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像影子一样忠实地附着在产品的价值上，不能让两者之间存在丝毫的永久差距。……诚然，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具有服务于商品生产的能力。……并且这些商品也比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可以生产的商品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这种更高的价值也必然导致所用劳动力和土地的服务的更高价值。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元素可以永久地依附于这些中间生产资料（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60, 162）。

⁴ 从奈特主义新古典视角对这种奥地利学派观点的攻击，参见 Earl Rolph, “The Discounted Marginal Productivity Doctrine,” in W. Fellner and B. Haley, eds.,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hiladelphia: Blakiston, 1946), pp 278–93. 有关反驳，请参阅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vol. I (Los Angeles: Nash Publishing Co., 1970), 431–33.

⁵ 关于这种所谓的同步，参见 Khan, *Schumpeter's Theory*, pp. 51, 53. 生产同步的概念是熊彼特从约翰·贝茨·克拉克那里得到的最非奥地利学派的概念，这反过来又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克拉克-奈特资本概念与奥地利学派哈耶克、马赫鲁普和博尔丁观点之间的著名斗争。见同上，p. 6n. 另见 F.A. 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in Fellner and Haley, *Readings*, pp. 355–83.

类财货分配的任何年龄结构的程度上。⁶既然生产神奇地“同步”了，那么土地和劳动力就没有必要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任何预付款。正如熊彼特所写：

【工人或土地所有者】没有必要请求现在消费财货的任何“预付款”。……个人不必考虑当前时期之后的问题。……经济过程的机制确保它同时也为未来提供。……因此，积累这种库存【支付给劳动力的消费财货】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

从这组奇怪的假设中，熊彼特指出，“它得出结论”，“在任何地方，即使在贸易经济中，生产的生产资料也不过是暂时的物品。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们履行任何功能的库存。”通过进一步否认有任何“累积的消费财货存量”准备支付给劳动力和土地所有者，熊彼特同时也否认了这一明显事实，即工资和租金总是从资本家的累积储蓄中支付，这些储蓄本来可以花费在消费财货上，但将支出为劳动力和土地所有者的当前收入。

熊彼特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原因是，当工人和土地所有者用他们的服务换取现在货币时，他否认这些涉及消费财货的“预付款”，因为“这只是交换问题，而不是信用交易问题。时间因素不起作用。”熊彼特在这里忽略了庞巴维克深刻的见解，即时间市场不仅仅是信用市场。因为当工人和土地所有者现在因为那些只会在未来为资本家带来回报的产品赚钱时，他们正在接收由资本家储蓄支付的生产预付款，而实际上他们以利息回报的形式向资本家支付了贴现。⁷

在大多数最终均衡的概念中，净储蓄为零，但利息高到足以诱导资本家进行总储蓄以仅更换资本设备。但在熊彼特的均衡中，利息为零，这意味着总储蓄也为零。似乎既没有激励资本家在熊彼特的均衡中维持他们的资本设备，也没有手段让他们这样做。因此，熊彼特的均衡在内部是不一致的，也是无法维持的。⁸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用他惯用的清晰散文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资本的使用没有收益……就没有理由不消费它。如果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不能生产净产品，那么当这些资源可能用于提供当前的享受时，

⁶ 用汗的话来说，对于熊彼特来说，“资本不能有任何年龄结构，并且在其控制生产资料的功能过程中消亡”（Khan, *Schumpeter's Theory*, p. 48）。熊彼特通过将资本完全从资本财货的体现中分离出来，并将这一概念仅限于用于购买这些财货的货币资金来实现这一壮举。因此，对于熊彼特来说，资本（如利息）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而不是植根于实际财货或实际交易。参见 Schumpe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16–17.

⁷ 参见 Schumpe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43–44.

⁸ Clemence and Doody 试图反驳这一指控，但假设时间偏好为零。然后，资本家会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回报感兴趣，而不考虑他们何时会收获。因此，资本财货将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但对于那些相信每个人都有正的时间偏好率并因此对未来回报进行正折现的人来说，零回报率会迅速导致资本枯竭，当然也会导致固定均衡的崩溃。Richard V. Clemence and Francis S. Doody, *The Schumpeterian System*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1950), pp. 28–30.

为什么还要投入资源来维护它们呢？如果拥有一个蛋糕没有任何收获，一个人就不会拥有它而非吃掉它。简而言之，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是利率保持了静止状态——在将收入转化为资本或将资本转化为收入时无需支付的利率。如果利息消失，静止状态将不再静止。熊彼特可以争辩说，一旦达到静态均衡，就不会进行积累。但是，除非他承认利息的存在，否则他无权争辩说不会有负积累。⁹（强调为后加）

回到熊彼特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开始于由零利率修正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那么任何经济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在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看来，经济发展是通过对更迂回的生产过程进行更多投资来实现的，而这种投资是时间偏好率普遍下降所带来的更多净储蓄的结果。在这样的下降时，人们更愿意放弃消费并将更大比例的收入储蓄起来，从而投资于更多的资本和更长的生产过程。在瓦尔拉斯的图式（schema）中，变化只能通过品味、技术或资源的改变而发生。时间偏好的变化将成为消费者“品味”或价值观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对于熊彼特来说，**没有**时间偏好，也没有均衡中的储蓄。因此，消费者的品味与增加投资无关，此外，**没有储蓄**或利息收入可用于进行此类投资。品味或时间偏好的改变不能成为经济变化的引擎，对变化的投资也不能来自储蓄、利润或利息。

至于除了时间偏好之外的消费者价值观或品味，熊彼特坚信消费者是被动的生物，他无法将他们设想为经济变化的主动推动者。¹⁰即使消费者的口味发生了主动的变化，仅仅是需求从一种产品转移到另一种产品怎么能带来经济发展？

对于熊彼特来说，**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不比品味更好。首先，土地和劳动力的供应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变化，更不能解释刺激和体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投资。

随着品味和资源的处理，熊彼特的均衡系统中只剩下一逻辑上可能的变化或发展工具：技术。“创新”（具体技术知识或生产功能的变化）对熊彼特来说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能途径。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佩服熊彼特所谓的对经济史的现实洞察力，将技术创新视为发展和商业周期的源泉，是完全没有抓住重点的。因为这个结论不是熊彼特的经验见解。从逻辑上讲，这是他摆脱自己制造的瓦尔拉斯（或新瓦尔拉斯）的盒子的唯一途径；这是在他的系统中发生任何经济变化的唯一途径。

⁹ 在 Lionel Robbins,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Economic Journal* 40 (June 1930): pp. 211–14. 对熊彼特零利率均衡的出色批判中。另见 Gottfried Haberler, “Schumpeter’s Theory of Interes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ay 1951): 122ff.

¹⁰ 因此，熊彼特写道：“不是大量的消费者在诱导生产。相反，人群被生产中的关键人物所掌握和领导”（强调为熊彼特的）见于“Die neuere Wirtschaftstheor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Recent Economic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mollers Jahrbuch* (1910), cited in Schneider, *Joseph A. Schumpeter*, p. 13.

但是，如果创新是摆脱熊彼特的盒子的唯一途径，那么如何为这种创新提供资金呢？因为在熊彼特的均衡中没有储蓄，没有利润，也没有利息回报。熊彼特陷入了困境：因为在他自己的体系中，没有办法为创新提供资金，因此经济也无法摆脱他自己特别严格的瓦尔拉斯的盒子的变体。因此，熊彼特必须发明一种天外救星，一个来自他的系统之外的外生变量，它将使经济摆脱困境并成为经济变化的唯一可能引擎。而那个天外救星就是通胀性的银行信用。必须假设银行通过部分准备金信用扩大货币供应，并且更多地将新资金提供给创新者——愿意并能够投资于新技术、新流程、新行业的新企业家。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定义，没有可供他们投资或借贷的储蓄。

因此，创新是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工具，而创新是由通胀性的银行信用提供资金的，这一结论并不是约瑟夫·熊彼特发现的具有洞察力的经验概括。这根本不是经验概括。事实上，它与现实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尽管他的结论似乎是暗示性的，但这只是熊彼特错误假设和封闭系统的逻辑结果，也是打破其瓦尔拉斯的盒子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方式。

人们也看到了，为什么对于熊彼特来说，企业家总是扰乱平静，远离均衡的破坏性力量，而在冯·米塞斯和柯兹纳的奥地利学派传统中，企业家在均衡的方向和谐地调整经济。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企业家是现实世界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承担者，成功的企业家通过将资源、成本和价格进一步推向均衡方向来获取利润。但是熊彼特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开始的，而是在一般均衡——他坚持认为这是基本现实——的想象之地开始的。但是在静止和确定性的均衡世界中，没有企业家，也没有利润。通过逻辑推论，企业家精神的唯一作用是创新，破坏预先存在的均衡。企业家无法调整，因为一切都已经调整过了。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没有企业家的空间；只有通胀性的银行信用和创新才能使他存在。因此，他唯一规定的角色是具有破坏性和创新性。

然后，企业家向银行支付利息，利息对熊彼特来说是一种严格的货币现象。但是企业家-创新者从哪里得到钱来支付利息呢？从利润中，当他的创新成果进入市场，新工艺或产品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收入时，他将获得的利润。因此，利润只是成功创新的结果，而利息只是从利润中支付给通胀性银行的费用。

当然，通胀性的银行信用意味着价格上涨，也意味着资源转向创新投资。价格上涨，随后是工资和土地租金等要素价格的上涨。熊彼特成功地打破了瓦尔拉斯的盒子，虽然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他还没有完成他的问题。因为对他来说，打破他的盒子是不够的；他也必须回去。作为一个敬业的瓦尔拉斯主义者，他必须使经济回到另一个一般均衡状态，因为毕竟，根据定义，真正的均衡是变量一旦被替换后往往会回归的状态。回归如何进行？

为了使经济恢复均衡，利润和利息必须是短暂的。当然，创新也必须结束。这怎么可能发生？一方面，创新必须是不连续的；它们只能出现在离散的集群中。因为如果创新是**连续的**，经济就永远不会回到均衡状态。鉴于这种不连续集群的假设，熊彼特找到了一种方法：当创新“完成”并且新工艺或新产

品进入市场时，它们在竞争中超过了旧工艺和产品，从而获得了支付利息的利润。但是，这些利润是以旧的、现在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行业的严重损失为代价的，这些公司或行业被逼到了墙边。过了一会儿，创新完成了，无情的归属过程摧毁了所有的利润，因此也摧毁了所有的利息，而老公司的突然损失也结束了。经济回到不变的循环流动，并停留在那里，直到出现另一次创新成群发生，然后循环重新开始。

“周期”在这里是一个有效的术语，因为在制定突破和回归的逻辑过程时，熊彼特似乎同时发展了一个独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第一阶段，即突破，看起来很像商业周期的典型繁荣阶段：通胀性的银行信用、物价和工资上涨、普遍欣喜若狂，以及资源转向更多投资。然后，创新“完成”之后的事件看起来很像典型的衰退或萧条：老公司突然遭受严重损失、裁员。最后，创新和兴奋都消失了，最终损失和破坏也消失了——简而言之，回到一个平静的时期，看起来像是静止的均衡状态。

但熊彼特的学说只是**看起来**像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具有挑战性的商业周期理论。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周期理论。这只是熊彼特能够突破然后回归瓦尔拉斯的盒子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方式。因此，它当然是一个巧妙的表述，但它与现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联系。

即使在他自己的理论中，也确实存在严重的缺陷。在完全确定的瓦尔拉斯的世界中（这一假设并没有随着创新者的到来而放松），老企业是如何等到创新“完成”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正在遭受严重损失的？在一个知识和期望完全的世界里，老牌公司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并尽早采取措施适应它。因此，在一个充满完全期望的世界中，不会有损失，也不会出现衰退或萧条阶段。不会有经济学家所知的周期。

最后，熊彼特的约束模型只有在创新成群发生时才有效，而此类成群发生的经验证据几乎为零。¹¹在现实世界中，创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因此，没有理由假设任何回归均衡，即使它曾经存在于过去。

总之，熊彼特的发展和商业周期理论以其对创新、银行信用和企业家的暗示性和看似有意义的讨论给许多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提供的不仅仅是静态的瓦尔拉斯主义均衡分析，而是提供了经济动态、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然而，事实上，熊彼特看似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与现实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没有提供经济动态；他只是找到了一种巧妙但错误的方法来试图打破静态的瓦尔拉斯的盒子。他的理论只是均衡逻辑的练习，没有任何结果。

毫无疑问，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一不幸的事实，促使熊彼特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从他 1912 年《经济发展理论》的开放周期模型，扩展到近三十年后他在两卷本《商业周期》中的三周期图式。¹²更具体地说，熊彼特看到了将他的模

¹¹ 参见 Simon S. Kuznets, “Schumpeter’s Business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0).

¹² Joseph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型应用于现实的问题之一是，如果繁荣期的长度取决于“完成”创新并将其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长度，那么他的模型将如何应用于现实生活，在这里创新是同时发生的，每个创新都需要不同的时间来完成？他后来的三周期理论是一次包含这些现实生活问题的绝望尝试。具体来说，熊彼特现在假设经济不是单一地突破并回归均衡，而是由三个独立密封的、严格周期性的周期组成——“基钦”（*Kitchin*）、“朱格拉”（*Juglar*）和“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每个都有相同的创新-通货膨胀-萧条的特征。凭幻想做出这种所谓独立的潜在周期——每个周期都相互切断，但都相互叠加以产生现实世界的可观察结果，只能被认为是绝望地陷入神秘主义，以便支持他的原始模型。

首先，经济中同时发生的创新远不止三种，没有理由假设每组不同的变化都有严格的周期性。事实上，并不存在理论所要求的创新成群发生。其次，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价格和活动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密封的周期。多周期图式是不必要且粗心的实体增加，公然违反了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了挽救该理论，它断言了不可证伪的命题，因为总是可以变出另一个周期来解释异常情况。¹³为了挽救他最初的模型，熊彼特只成功地在旧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和更大的谬误。

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最流行的经济变化动态理论是阿尔文·H. 汉森（*Alvin H. Hansen*）教授提出的“长期停滞”（或“经济成熟度”）的阴郁学说（*the gloomy doctrine*）。¹⁴对汉森来说，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解释是，美国陷入了永久停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它。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一两年后，汉森就攀上了新经济学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但长期停滞虽然给凯恩斯主义留下了左翼色彩，但与凯恩斯主义理论无关。对于凯恩斯来说，繁荣或萧条的关键是私人投资：繁荣的私人投资意味着繁荣；弱而断断续续的投资导致萧条。但是凯恩斯在投资问题上是不可知论者，而汉森则提供了他自己的见解。汉森认为，美国的私人投资注定永远脆弱，因为（1）边境现在已经关闭；（2）人口增长迅速下降；（3）几乎没有进一步的发明，少有的几个发明将是节省资本而非节省劳动力的品种，因此总投资不会增加。

乔治·特博格（*George Terborgh*）在他著名的停滞主题《经济成熟度的幽灵》（*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中专注于对统计的批判。¹⁵如果边境自世纪之交以来就“关闭”了，那么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近 30 年里出现了繁荣？几十年来，人口增长也一直在下降。也很容易推翻一个相当奇怪和大胆的预测，即只会发现很少或再也不会发现进一步的发明——至少是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历史上不时发生的对发明停止的预测很容易成为嘲笑的对象。

¹³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命题都必须是可证伪的；它们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也可以从不证自明的公理推导出来。但是没有人可以声称所谓的基钦、朱格拉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任何意义上是不证自明的。

¹⁴ 参见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W. Norton, 1941). 有关他立场的清晰总结，请参见 Hansen,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in G. Haberler, ed., *Reading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Philadelphia: Blakiston, 1944), pp. 366-84.

¹⁵ *George Terborgh, 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 (Chicago: Machinery and Allied Products Institute, 1945).

但特博格从未深入了解汉森论点的基本原理。在人口末日论者和零人口增长狂热者不断喧嚣的时代，当担心人口增长**放缓**似乎有道理的时候，很难营造出这样一种智识氛围。但是，为什么汉森确实应该将人口增长视为根据事实本身刺激投资的积极因素？为什么这种增长放缓会成为衰退的推动力？熊彼特在他自己对汉森论点的批判中，明智地指出，人口增长很容易导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¹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彼特并没有意识到汉森也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打破瓦尔拉斯的盒子。汉森含蓄地（不像熊彼特那样明确地）从循环流动和一般均衡开始，然后考虑了可能改变——或者更具体地说，可能增加——的各种可能因素。这些就是熟悉的瓦尔拉斯三件套：土地、劳动力和技术。正如特博格所指出的，汉森对“投资机会”的看法是静态的。他把它们当作一个有限的物理实体，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它们是固定金额，当达到最大金额时，投资机会“饱和”并消失。汉森隐含的假设是，这些机会只能通过增加土地、劳动力和改进技术（汉森仅限于**发明**而不是熊彼特式的创新）来产生。因此，边境的关闭意味着“土地-投资机会”的枯竭，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人口增长放缓，即“劳动力-投资机会”的终结，导致创新无法承载剩余负担的局面。

因此，汉森对人口增长减少的经济影响的奇怪观点，尽管看起来似乎是悲观的经验主义，但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经验概括。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提到动态变化或现实世界。所谓的高人口增长的有利影响仅仅是汉森自己试图逃离瓦尔拉斯的盒子的不成功变体的逻辑衍生。

¹⁶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p. 74.